

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

齐峰 李雪枫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ISBN 7-203-04111-2

定价：25.00元

（以下文字因模糊无法准确转录）

The Publishing History of Shanxi Revolutionary Base

齐峰 李雪枫 著

山西革命

根据地

出版史



The Publishing History of Shanxi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山西革命
根据地
出版史

基金项目

齐峰 李雪枫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 / 齐峰, 李雪枫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440-3798-3

I. ①山… II. ①齐… ②李… III. ①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出版工作—文化史 ②出版工作—文化史—山西省—1937~1949 IV. ①G23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2419号

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

出版人 荆作栋

责任编辑 杨文

复审 李飞

终审 刘立平

书籍设计 王春声 薛菲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邮编 030002)

印装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2

字数 338千字

版次 2010年4月山西第1版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40-3798-3

定价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937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境内建立了晋察冀、晋绥、太行、太岳四大革命根据地。在四大革命根据地内，出版活动相当活跃，书、报、刊的出版印刷种类数量庞大，不仅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论持久战》《小二黑结婚》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书籍，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印刷、发行体系。根据地的出版史是中国近当代出版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本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山西四大革命根据地的出版脉络，包括编、印、发等各个环节，介绍了如邓拓等一大批出版人物，加配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图照，为研究根据地出版史提供了资料。

总序

柳田泉



中国乃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民族文化积累和传承的过程中，“书”作为不可或缺的载体承担着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人们谈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仍津津乐道于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巨大贡献。正是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双峰并立，使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传播方式，并直接促成、带动了“中国出版史”的展开。研究显示，早在公元8世纪左右，我国已有了较为成熟的雕版印刷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金刚经》，即唐咸通九年（868年）的作品。之后的千余年间，世界印刷技术几度飞跃，中国印刷或引领世界潮流，或吐故纳新，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中国出版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中国出版的辉煌历史成就相比，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则要滞后许多。据现有资料所知，我国最早的出版史著作是杨寿清的《中国出版界简史》，该书由上海永祥印书馆于1946年出版。在这本不足4万字的小册子中，四篇叙述分别为：“古代中国的出版业”、“‘五四’时代出版界的发展”、“‘一二·八’后出版界的倾向”、“对于中国出版界的批判与希望”。今天如果严格从学术的角度来考量，这本《简史》的价值或许仅仅限于“开风气之先”了，其有限的篇幅、勉强的分期、局促的内容，并不能完整勾勒出中国出版历史千余年来元气淋漓的全貌。新中国成立初期，张静庐先生倾心辑注的七编八册本《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料》，已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重要资料。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出版史著作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才陆续问世。应该说，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中国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和编辑出版学科的确立，

为中国出版史的写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一批作为高等院校编辑出版学教材的中国出版史著作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著作或偏向于“编辑”，或倾向于“出版”，或着重于“印刷”，或几者兼而有之，尽管其叙述的着眼点不同，用笔的重点有别，但在出版史写作中呈现出的“百花齐放”特色，共同开启了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崭新一页。

与此同时，关注中国出版史的学者们不断拓宽研究视野，转换研究视角。在“中国出版史”的大概念下，不少学者逐步展开了更加细致的出版断代史、地方出版史的研究与写作。如在21世纪初，周宝荣、田建平、缪咏禾三位研究者分别推出了《宋代出版史研究》《元代出版史》《明代出版史稿》，叶再生先生也出版了洋洋400万言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这些著作成为中国出版史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成果。而在地方出版史研究领域，近年来也有北京、上海、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苏、安徽等近二十个省市推出了各自的出版史著作，这些著作或按照中国出版历史的发展历程展开研究，兼顾古代和近现代；或只取其中某一阶段，着重描述和呈现地方出版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体现出了“以小见大”、“从细微处着眼”的良好研究风气，其成果也不断丰富着中国出版史的研究。

今天我所推介的这套“山西出版史”，是近年来中国出版史著中的优秀之作。我们知道，山西自古以来就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古晋国存在了900年，留下了《晋

乘》《晋语》《唐风》《魏风》《侯马盟书》等早期的三晋文化著述；隋唐时期山西文化事业更为发达，太原王氏、闻喜裴氏、汾阴薛氏、河东柳氏等名闻天下，著作甚丰；至五代时山西人冯道校刻了《十二经》，毋昭裔校刻了《九经》《文选》，官刻、私刻发展迅速，显示了当时雕刻印刷业的最高水平；宋代山西刻印业北有五台，中有太原，南有绛州，刻版内容涉及史志、医籍、集部及佛经；金朝时山西平水取代河南开封，成为黄河以北地区的唯一的刻书中心，“平水本”名扬天下；明清以降乃至民国初期，山西一直是北方地区的出版重镇；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又使这里成为根据地出版事业的主阵地。该书正是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山西出版的历史进行了完整的、系统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山西地方出版史研究的空白，且为重写中国大出版史提供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取得借鉴，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课题。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曾有言：“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一个民族，只有重视历史，才具有高度的自我发展意识，才能胸怀宽广，视野开阔。历史研究有两个取向：其一，秉承求真的研究精神；其二，坚持科学的价值取向。无论叙述还是论断，均需要史实支撑，遵循逻辑判断，否则，叙述就成为臆测，论断将流于杂论，失却了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山西出版史”分《山西古代出版史》《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山西国统区出版史》三册，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科研成果。

该课题能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应该说从课题立项之始就显示出较高起点，而洋洋百万言的研究成果也的确不负众望，在该课题结项时即被评为优秀。从历史研究的原则综观该书，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第一，该书作为一部地方出版史，力求在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出山西出版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突出原创性。如过去各种关于山西出版的研究多停留在旧人之说，几乎不涉及山西地区在唐宋雕版印刷、辽代刻本以及金元平水本对于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影响，因而割裂了山西出版的文化延续性。而该书则着眼于历史的承续性，着重反映山西出版事业在中国文化传播交流中的特有地位和作用。第二，对新发现的辽代契丹文刻本的研究，不仅弥补了少数民族出版史研究的缺陷，且为后人洞开了进入少数民族文化核心的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对于山西古代出版史的研究，不仅是对于古代山西地区文化传播史的研究，更有助于对民族文化遗产史、交流史的探讨。第三，对于山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红色出版史”的研究，填补了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在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抗战的中心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此建立了晋察冀、晋绥、太行、太岳等四大革命根据地，与此关联，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活动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胜利。研究这一特殊时期的山西出版，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党的文化政策、出版政策，并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新闻出版政策的确立找到直接的依据。第四，对山西国统区出版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为重写大出版史提供了最新的科研成果。该书通过整整一册的篇幅研究山西国统区的出版，既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更折射出研究者崇高的学术追求和难得的学术勇气。

梁启超把研究历史的目的归纳为“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其所谓“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则说明了历史认识的一种本质，即历史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简单复写，而是不断地以当代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估。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曾呈下降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史学研究一度游离社会发展主题，出现了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脱节的现象。要改变史学的这种边缘化趋势，必须重塑研究者的知识结构。

学术有幸薪火传承，对于编辑出版学这门新兴的学科而言，需要有更多有志的年轻同志以与时俱进的思维与品格，投入到扎扎实实的研究之中。本书主要作者齐峰同志是近年来编辑出版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中年学者，既有深厚的学院背景，更有丰富的新闻出版从业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今编辑出版学研究者的整体状况。这批研究者继承了老一辈学者勤奋、严谨的治史传统，又体现出了新一代学者锐意开拓、敢于啃硬的创新精神和时代特色，让我感到十分的高兴。借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同志投身到编辑出版学的科学研究中来，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自序



山西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位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民族救亡图存、国家生死攸关之时，表里山河、襟喉雄要之山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最重要的根据地，抗争牵制，捐生效命，更成为这一风云际会时期不折不扣的出版重镇，销铄铸字，阵前付梓。十余年间，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出版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及大，在出版规模、出版种类、出版队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了傲人业绩，殊勋可旌，史迹有篇，其出版物功效惠及大业，影响波及全国，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出版奠定了基础，渠成了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系统地研究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出版历程，对于缕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政策之走向，具有钩深致远、探赜索隐的价值。

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之一大特点，是多种出版物的同生共兴，出版各环节的运转流畅。在根据地，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严格的报刊社和出版社之分的，报刊社可刊图书，书店也可出报刊，至于何时出版何种读物，全然在于形势之需要。报刊所登载，信息浩繁，周期密集，内容生动，形式多样，既可规避纸张短缺、物资匮乏之困难，又能极限发挥宣传出版之预导作用，因而得到了革命队伍的广泛重视。图书虽说形式单一，但却容量累累，便于度藏储运和反复阅读，所以更多地被用做刊载领袖著作和系统理论知识。此外，为保障生产地点之安全，躲避传播过程之不测，并赢得制作时间，出版单位还需同时负责印刷工作，承担发行任务，这就使得出版部门建立初始即兼有编、印、发、供的职能。近年来，我国出版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其中的任务之一，即组建大型出版集团，通过整合编、印、发资源，实现一体化运作。“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团队作战”，既是特定时期革命队伍的战术策略，也是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特色之一，也为时下中国出版实现集约化、产业化经营，提供了一个可资龟鉴的范例。

重视根据地国民教育，大量出版普及性教材，是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的又一特色。根据地穷苦百姓的识字率很低，为觉悟更多的人投身革命事业，根据地政府开设了不同形式的文化培训班、扫盲班、普及班，同时通过出版多种类型的教科书，帮助人们学文化，扫文盲。由于此类教材品种



繁多，形式多样，且针对性强，兼及知识性与趣味性，故广受欢迎，也为文化普及工作提供了便利。应该说，山西革命根据地教材的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化传播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其上承“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思想启蒙”、“开启民智”责任，启蒙所及，风熏远乡；另一方面，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教普及进行了有益尝试，其编写教材时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倡导寓教于乐、因材施教的理念，时至今日仍不失为一普教良方。

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图书的出版，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展开进行了精神和技术上的准备。一般说来，学术界把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止于1949年的文学称为“现代文学”，把1949年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然而，所谓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怎一个年份可以明确分割。当代文学的源头何在，滥觞何处，此乃文学研究界历久争论的问题。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工作总的指导方针。很快，一批重在实践《讲话》精神的文艺书籍相继出版，这其中既包括小调、剧本、秧歌词等通俗文艺出版物，也包括在解放区享有盛名的赵树理的小说。今天看来，当年赵树理小说的出版，毫无疑问与当时党的文艺政策和出版政策密切相关。无论是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邪不压正》，还是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都对民间文艺形式进行了尝试性借鉴，以群众饶有兴趣、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解放区崭新的生活与向上的风貌，成为文艺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劳苦大众的典范，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出版的精神理路。中国当代出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应该说在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中已现清晰端绪。

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同时致力于领袖著作和革命经典著作的介绍，在更大范围内宣传共产主义运动，如此便构成了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的另一特色。从掌握的资料看，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重要人物的著作，有不少就是在山西革命根据地首次出版的。如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出版，开创了革命领袖著作出版之先河；而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崇因影响的《毛泽东选集》，最早也是在山西革命根据地由邓拓等人编辑出版的。尤其是《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不仅使毛泽东同志不同阶段的思想成果得以系统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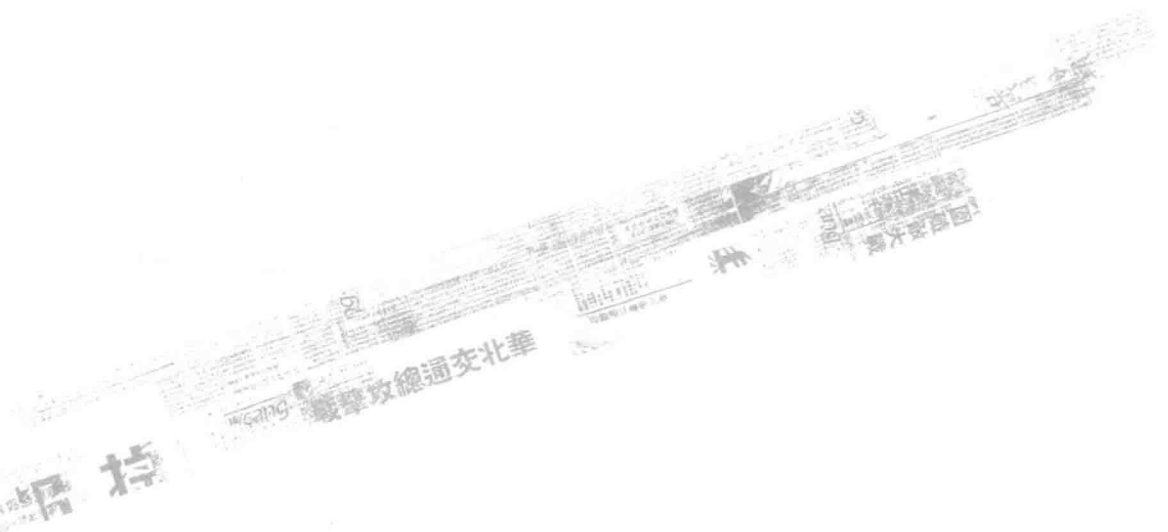
理，更从恢廓角度展示了党的第一代领导的集体智慧和胆识，使毛泽东思想及党的各项政策得以迅速传布。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十余年间，山西革命根据地共计出版马恩列斯及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著作81种，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提高整个革命队伍的素质意义重大，且成为特定时期其思想的荦荦大端、中流砥柱，为这支队伍在困难条件下励精图治、自强不息发挥了巨大作用。

鉴于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所取得的历史功绩，在展开本课题研究时，作者特别注意了史料的实证作用，以图达到以史立论、实事求是的效果，并能为当代中国出版的发展提供借鉴。诞生于1940年的晋西北新华书店乃延安新华书店的第一家分店。此间，山西革命根据地内的多家新华书店建立了赫赫功业，形成了光荣传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一强劲的文化品牌，直至今日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传播功能。因此，对于新华书店在山西革命根据地的诞生、发展、变迁，本书进行了专章表述，岂止是对已逝岁月中鱼鱼雅雅、轰轰烈烈事业之回忆缅怀，慎终追远，更为了给当代出版发行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历史依据。此外，本书写作基于“史实”、“史料”、“史论”相结合的立论方式，不仅通过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确立论述之基础，更在于通过思考，以高蹈视觉对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出版事业进行一番俯瞰，尽可能还历史以真相，发掘揭示其对于当代出版的标量意义。烽火年代对于文献资料的留存极为不利，岁月其徂，转瞬甲子，后人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本书在写作不久即困顿于资料不足之尴尬，好在通过实地考察、人物专访，还是获取了一批“鲜活”材料，并以此佐证档案，予尘封以感性，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本书的原创性。

最后须说明的是，本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从立项到结项，间以切磋琢磨，焚膏继晷，承蒙柳斌杰、杨牧之、肖东发、尹韵公、郭贵春、顾棣诸公费神相助，匡我不逮，诲谕勤勤，佩甚念甚，高怀雅谊，谢悃不胜。此案在课题结项之时，评审专家不吝明教，卓裁赐正，且能忝列优秀阶陞，又使作者感同身受，心存纫佩。出版之前，本书已按专家所述种种，一一修正。即便如此，作者也深知本书挂一漏万、畸轻畸重之处恐难避免，因此，万望广大读者及业界同仁拨冗见示，资吾改进，莫以鄙陋而不堪教矣。

是为序。

目录



- 一 出版史研究的背景梳理__002
- 二 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概述__004
- 三 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的主要特点__010
- 四 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地域跨度__013
- 五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研究方法__014

- 第一节 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出版事业概况__020
 - 一 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及北岳区的区划沿革__020
 - 二 晋察冀边区新闻出版事业概述__021
- 第二节 政治理论的鲜明指向——根据地的期刊出版__024
 - 一 政治类期刊的代表——《战线》和《边政导报》__025
 - 二 百花齐放——根据地其他期刊的出版情况__027
 - 三 晋察冀根据地期刊出版的特点分析__030
- 第三节 根据地出版战线的第一声号角——《晋察冀日报》的创刊__033
 - 一 根据地最早的红色报纸——《晋察冀日报》__034
 - 二 根据地第一个大型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__037
 - 三 解放战争后期的《北岳日报》__038
 - 四 边区其他报纸的出版情况__039
- 第四节 划时代的焦点——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__041
 - 一 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__041
 - 二 其他各类图书出版情况__046
 - 三 晋察冀根据地图书出版的阶段和意义__048